

西部发展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罗中枢 主编

WESTERN
CHINA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9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9期

西部发展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罗中枢 主编

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资助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资助

《西部发展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罗中枢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铁	王 卓	石 硕	史云贵	朱晓明
罗中枢	次旦扎西	余潇枫	周 平	郝时远
姜晓萍	姚乐野	盖建民	潘志平	霍 巍

主 编：罗中枢

副主编：王 卓

编 务：李静玮 罗江月

学术支持单位：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目 录

CONTENTS

边疆评论

- 要继承和发扬边疆研究的中国传统 周伟洲 / 3
- 中国边疆学的机遇与挑战 罗中枢 / 10
- 中国边疆学要和国家发展节奏合拍 邢广程 / 27

贫困问题研究

- 川滇藏区生态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 沈茂英 / 39
- 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财政政策研究
- 以广西为例 梁艳鸿 覃娟 / 54
- “输血”与“造血”：新疆民族优惠政策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 谢贵平 / 67
- 云南藏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特点研究 张云熙 / 81

“一带一路”专题

- “一带一路”中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盛红生 / 95

理论探索

- “条约体系”冲击“朝贡体系”所形成的中国边疆问题
- 思考 王春焕 / 111

● 西部发展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9 期

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的现状与问题思考 王 卓 王佩琪 / 121

国家主义政治与历史书写

——以“中国青年党”中常委何鲁之史学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 朱晶进 徐鸿琳 / 135

清代治疆方略与我国西北边疆安全 张付新 / 152

青年学人专栏

险途不畏路传情

——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68 年至 1978 年援巴工人的口述史

..... 李梦鹤 / 179

敦煌吐鲁番风伯雨师信仰研究 魏睿骛 / 201

动 态

中国崛起与边疆发展

——“第五届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研讨会综述

..... 时 玥 王 卓 / 215

边疆评论

要继承和发扬边疆研究的中国传统^{*}

周伟洲^{**}

编者按：本文根据 2016 年 10 月 21—22 日“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期间，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的对周伟洲教授的深度访谈记录整理而成。“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

访谈人：张帆，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张帆：周老师您好！欢迎您来成都参加“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

周伟洲：你好。我来过成都很多次，小时候还在成都生活过一段时间。

张帆：是什么时间？

周伟洲：中学的时候。我父亲是成都铁路局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因为工作原因经常调动。1952 年，因为一次工作调动，我们全家迁到了成都生活。我有幸进入当时的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学习，成都第七中学原来叫国立成都县中学。那个学校有 100 多年的历史。我入学的时候校址在青龙街，1955 年学校迁到磨子桥，离成都工学院和四川大学很近。每到星期六，我经常到成都工学院的大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成都工学院就是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现在已经和四川大学合并了。整个中学六年，对我的

^{*} 本文经过受访者本人审定。

^{**} 周伟洲（1940~），男，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非常关键。

张帆：这话怎么说？

周伟洲：我从小就爱看书。记得1951年在重庆读小学五年级时，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都答不上来，最后叫我回答，我答得很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预兆着我以后将从事史学研究吧。不过当时我对历史没有特别的兴趣，主要爱好是文学。

刚才我说过，我父亲是一个小职员，家里七个子女，我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没条件买书藏书。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到了成都读中学（成都第七中学）以后，在众多课程中，我对语文、历史特别偏爱。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格的图书馆，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里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几乎都读过。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作家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作家普希金、别林斯基、果戈理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

当时，我简直着了迷，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话，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高中一年级，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文科同学的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下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可以大有作为。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

张帆：考上大学以后您就离开成都了？

周伟洲：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的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没想

到在西安一待就是 50 多年。大学毕业以后，从 1962 年到 1966 年，我继续在西北大学跟随马长寿先生读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因为年代特殊，1967 年才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在博物馆待了 6 年左右，又回到西北大学当老师。

张帆：为什么您选择到西北大学读书呢？

周伟洲：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感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选中西北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当时考古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有。

张帆：您的大学四年是如何度过的？

周伟洲：到大学以后，我还是拼命读书。在农村劳动时，遇阴雨天休息，也要从北沈家桥赶回学校借还书；在“大炼钢铁”时期，去灞桥背矿石，在公共汽车上也看书。这种情况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协调。结果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多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放弃理想和学校丰富的藏书，所以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逃进书海之中。每天中午，趁同学们休息，我就躲在阅览室的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学校图书馆借书阅读。

大学四年，我的阅读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到大学三、四年级时，我还试着写小说、评论、电影剧本、杂文、历史和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各门基础课、考古专业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了系统的了解。

张帆：大学毕业以后，您继续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

周伟洲：1962 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按我当时的想法，想从事考古学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是，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们系的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的研究

生。最后我考上了。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史学研究的领域。

张帆：您研究生阶段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周伟洲：读研究生一共有四年多时间，因为当时的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李家村、延安青化砭和青海省刚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专业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要我们一个星期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和治学方法基本形成了。

张帆：是不是因为您的积累比较厚，所以后来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广？

周伟洲：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专业是考古和中国民族史，以后研究的领域较广，西北民族史（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民族史）、西藏（藏族）史、新疆（西域）史，还有西夏和党项及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等方面，都做了一点儿研究。由于大学本科学的是考古专业，所以也做了一些文物研究，而且主要是研究与民族有关的文物。因为主要是搞民族史，所以也涉及边疆的研究。

张帆：您开始和边疆研究接触是在什么时候？

周伟洲：是在1973年由陕西省博物馆借调回西北大学，参加当时西北几省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一书，直到1979年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不少关于近代西北边疆的历史知识，撰写了几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是《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刊载在《历史研究》1976年第3期上。

张帆：能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吗？

周伟洲：我们学校的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现在只有12个专业人员，没有你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的研究人员多。主要是你们学校的支持力度太大了。希望你们越做越大，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陕西师大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是和院系平行的处级单位，有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博士

点，挂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面。现在有 100 多个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我们起步比较早，比四川大学稍微早一点儿。我评上博导是 1993 年，是国务院最后批准的一批博导。2001 年我从西北大学调到陕西师大，当时陕西师大成立了“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13 年才改名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我把老师马长寿先生的学术传统都带过去了。

张帆：我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从 2016 年开始，在边疆学方向招了 12 名硕士生、4 名博士生。^①这是一个新兴的、还在建设中的学科，四川大学开始有了第一批边疆学的研究生。周老师对这些同学有什么建议？因为他们未来都是我们边疆学研究的骨干人员。

周伟洲：我 1962 年开始读研究生，跟马长寿先生学民族史。但是政治运动不断，真正学习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其他时间都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青海刚察，青海湖北边待了将近一年。我们这一代学者大多有些缺陷，比如与国外有关学术界没有什么交流，我自己外语就没学好，藏文学了一年，也没学好。我对现在边疆学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希望就是，研究西藏一定要懂藏文，研究新疆一定要懂维吾尔语和维吾尔文。

现在的学习和研究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了。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做研究一定要关注现实，这一点也希望现在的学生能够注意。在这方面我自己有点儿体会。

1963 年我们几个研究生随马长寿先生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在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老师发现了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开始认真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

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形势出发才最

^① 2017 年四川大学边疆中心招收边疆学专业博士生 13 名、硕士生 12 名。——编者注

后确定的。这篇论文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获得学界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的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因此,我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新兴的边疆学要重视现实、为现实服务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

边疆学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所以要求研究者既要“专”,即具有较为雄厚的专业基础;又要“博”,即对其他的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均应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视野开阔、研究深入。这一方面,愿与同学们共勉。

张帆:请您谈谈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情况。

周伟洲: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下来个任务,就是“反修”。要撰写一本书,由西北大学牵头,西北几省联合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这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现在还很有价值。那时候经常往新疆跑。住在乌鲁木齐的宾馆里,讨论提纲,开一些学术讨论会。那时候新疆的民族关系很好,就是“盲流”多一点儿。“三年自然灾害”以后,这些人都是内地过去的,因为吃不饱,就去新疆找生活。因为新疆地广人稀,不管在哪儿刨块地就能活下来了。而且做小工什么的也可以赚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兵团也取消了,人员下放到地方。后来又恢复兵团了。其实兵团的设置是有道理的。中国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就有屯田,有的地方一个屯田点就有1000多人。边疆屯田是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很重要的传统之一。

最近几年新疆变化比较大,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建设,新疆处于核心区,相信以后发展会更快。

张帆:对于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的边疆学,我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该文回顾了中国边疆学从清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每个阶段的特征。在

这篇文章里我也提出了对构建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的一些构想，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学科发展上，我在今天上午的论坛发言中也讲到，我们在借鉴西方边疆研究成果的同时，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边疆学研究原有的优良传统，不能像现在有些年轻人那样，一味跟着外国人跑。这个倾向不好。你把我发在《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上的那篇《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看看。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学者借鉴西方中国边疆研究成果，努力探索中国边疆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借鉴；对国外一切有益和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科技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好的，从而抛弃了中国研究自己国家边疆的传统。”这篇文章和我上午的主题发言是一脉相承的。

张帆：谢谢周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王卓）

中国边疆学的机遇与挑战^{*}

罗中枢^{**}

编者按：本文根据 2016 年 10 月 21—22 日“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期间，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的对罗中枢教授的深度访谈记录整理而成。“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

访谈人：杨鹏飞，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李昊，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杨鹏飞：您这些年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并为国家建言献策，希望我国边疆发展得更好更快，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您这种以国家需要为导向的家国情怀，是学者的一种自觉吗？或者称之为学者的使命担当？

罗中枢：边疆研究涉及现实与历史交汇的宏大领域，我对西部边疆问题的关注同样缘起于现实与历史的际会。从现实来说，近年来边疆地区尤其是西部边疆地区不安宁，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关切。周边不稳，和平发展环境就面临挑战；边疆不稳，改革攻坚克难就面临风险。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边疆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关头，国家的崛起、人民的福祉、社会的稳定，都与

^{*} 本文经过受访者本人审定。

^{**} 罗中枢（1956~），男，原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边疆问题息息相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治国必治边”的战略判断。我国西部边疆毗邻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周边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武装冲突与人道灾难频发，恐怖主义与宗教纷争严峻，特别是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对整个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乃至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形成了压力。因此，边疆问题关乎全局，边疆地区是国际与国内两种风险的叠加地带，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大通道，是我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撑点，也成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重要抓手。

从历史上看，边疆稳则国家安，国力盛则边疆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处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一般是民族聚居区域，这些地带恰好也是治理上的薄弱区域，面临政治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民生事业发展、经济社会建设等领域的挑战严峻，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边疆地区稳定、发展、改革的关系，就可能形成影响整个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短板”。四川大学是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作为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华西协成大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该学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边疆研究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形成了边疆研究流派。在随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战中，华西边疆研究与当时的许多其他研究一样，湮没在历史长河的深处。但是，华西边疆研究聚焦边疆问题的理论视域、探索边疆理论前沿的学术传统、回应国家需求的学术自觉传承了下来，成为四川大学的重要校史和宝贵史料。作为一名川大人，我深切地体会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声中所蕴含的边疆研究情怀。

西部边疆还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中央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沿海和内地按照既定目标全面实现小康应该不成问题，真正的难点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历史欠账较多，人与资源矛盾突出，贫困人口集中连片，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如何实现小康建设的目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推进的梯次